

光辉历程 与时俱进

——天津师大中共党史、党建研究论文集

翟昌民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关于中共党史、党建研究论文集，包括三部分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现代化建设与实践研究；执政党的建设研究。

书 名：光辉历程 与时俱进
——天津师大中共党史、党建研究论文集

作 者：翟昌民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ISBN：7-201-05111-3/D23-53

定 价：23.00

序 言

呈现在您面前的是一本关于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的论文集。

天津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是 1983 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单位。二十多年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遵循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在学科建设、研究生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发挥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资政育人的功能,作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中共党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沿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党的建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及其规律等研究方向深入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我们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①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角度,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各种文化思潮纷呈和交锋的舞台上,中国共产党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

文化,使二者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时,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载体——知识分子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也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②着重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方面侧重研究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如何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统一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何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深刻揭示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的胜利。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方面,从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视角,重点研究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以及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③对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法西斯统治,以及推进民主建设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关于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除本论文集收入的部分学术论文外,还有《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思潮研究》、《远见卓识——周恩来知识分子思想研究》、《战后中美关系史》等专著问世。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我们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理论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中国过渡时期的特殊本质,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变化,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独到见解。②较系统地研究了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艰辛探索,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系统认识。③研究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思想。④着重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研究。关于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除本论文集收入的部分学术论文外,还有《回首建国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回顾与思考》、《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论》、《历史的丰碑——从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形成特征论纲》、《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跨越——近代中国文化变迁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铸魂——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要揽》、《走向新时代》等专著问世。

关于执政党建设研究,我们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①重点研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领导集体的忧患意识,深刻阐释忧党、忧国、忧民是三代领导集体强调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动因之一。②在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上,重点研究三代领导集体在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上进行的探索和努力。③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重点研究城市社区党的建设。执政党建设研究是目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也是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课题。我们现在正致力于深入研究,除本论文集收入的学术论文外,还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等专著出版。作为党的建设学术研究的阵地,我们有志于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在研究历史、总结经验、资政育人、加强党建方面,发挥着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作用。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为党史、党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和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决心抓住机遇,努力奋斗,争取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上能有较大突破。当然,我们也深知,在全国众多的党史、党建学科中,我们的研究水平还很有限,热切希望能与同仁们交流、切磋。今天我们将部分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并期望得到专家学者

们的指导和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收在本集中的文章大部分都发表过,此次出版,基本保持原貌,只是对个别的文字标点做了少量必要的修改。

编 者

2005.7.1

目 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

3/“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原因	邸彦莉
9/“五四”批判精神辨析	郭亚全
17/“五四”时期的天津商会	于岩青
25/试论邓小平抗日根据地建设思想	张 莉
33/论抗战爆发前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思想的	
形成	翟昌民
44/联结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总战略的纽带	翟昌民
57/1939 年中间党派的宪政提案评述	兰 芳
67/1940 年中间党派与“期成会修正案”	兰 芳
78/反共反民族的新民合作社运动	王 强
103/中共七大提出“建立联合政府”是战略目标还是	
策略口号	翟昌民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121/试析毛泽东对过渡时期认识的变化及其原因 ...	翟昌民
132/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与中国革命的	
实践	翟昌民
142/毛泽东的外交理论与实践	于岩青
150/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评析	翟昌民
163/刘少奇创建托拉斯的思想	李朝阳

169/周恩来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思想论析	魏继昆
186/计量分析:陈云经济思想方法论的特点和 优点	魏继昆
197/刘少奇策略思想研究述评	郭 亚 冯 毅
210/试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翟昌民
22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 历史启示	郭亚全
230/江泽民同志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的 新贡献	翟昌民
239/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认识历程	翟昌民
251/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的新思考	王同起

三、执政党的建设研究

265/建国前夕毛泽东的党建理论	郭亚全
272/赢得民心向党是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	翟昌民
283/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于岩青
289/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党的 建设	郭亚全 励维志
296/新时期党的建设需要现代化的观念	郭亚全
301/邓小平忧患意识论析	魏继昆
315/邓小平忧党意识及其特征论析	魏继昆
330/盛世危言:江泽民同志的忧患意识论析	魏继昆
338/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民主集中制建设的 探索	李朝阳 励维志
348/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学思想方法和 决策艺术	张 莉
354/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组织建设理论比较研究	杨 静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与实践研究

“五四”时期先进青年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原因

邱彦莉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紧闭的大门,使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怎样使满目疮痍的民族夺回失去的独立自主,走上富强之路,重新屹立于世界;怎样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和落后,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就成为近代中国无数志士仁人探索和实践的主题。

综观整个近代中国史,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举起新文化运动大旗的陈独秀,千百万的爱国志士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探索中国的出路。在中西文明的激烈碰撞中,受危机和忧患意识的驱使,中华民族被迫开始向西方文明寻求出路。从19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前,中国人在西方文明中寻找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信奉过基督教的天国福音,信奉过进化论与天赋人权,信奉过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信奉过无政府主义,等等。但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人在西方文明中寻找出路的努力无一例外地失败了。那些曾经唤起人们巨大热情和希望的资本主义道路屡走不通,民族并没有独立,国家并没有富强。究竟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指导革命取得胜利呢?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时代也在进行着比较和筛选。

正当无数志士不屈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客观现实,钦羡西方的文明与富强并把它们作为效仿的榜样的时候,世界范围的大

变动又强烈地吸引了中国人的目光。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了四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这不能不使醉心于学习西方的中国人大为震惊。于是人们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再次陷入焦虑和思索之中。

正当这时,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冲破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宣告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来临。它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振奋。这不仅给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指出了求得解放的道路,也使中国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希望,从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方。由此,彷徨苦闷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眼光从西方转到东方,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使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流行的一种新思潮。社会各阶级、各派别的代表人物都竞相宣传各种所谓社会主义的观点,各种研究新思想的团体和介绍新思潮的刊物纷纷出现。

在这名目繁多的新思潮中,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外,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等等,都被笼统当作社会主义接受过来。“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却都是混乱,不十分清晰的。”(《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5 页)当时思想界的多数人,对于这种类繁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也并没有固定信仰,人们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对社会主义还只是朦朦胧胧的向往,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

然而,正是在这种主义丛生、百说竞逐的氛围中,中国先进青年通过实践、比较和鉴别,逐步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中,选择并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

期。中国先进青年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的真理,不是偶然的。

第一,通过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鲜明对比,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屡次奋斗,但旧民主主义革命却连遭失败。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20世纪初,当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时,西方社会已百弊丛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混乱政局,舆论界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情绪开始弥漫开来。这种状况迫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必须重新考虑国家的出路,探索新的救国方案。恰在这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唤起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十月革命不但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特别是苏俄政府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华一切特权,这一行动所体现的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精神,同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大国联合欺压与羞辱中国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但提高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也开始把向外学习的视野从西方转向东方,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从而推动人们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

第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与竞逐,也给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新的救国方案,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与比较的机会。

中国先进分子正是在探索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它们提出的一些美妙的社会设想,对于抱有改造社会的善良愿望,而害怕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很有吸引力的。1919 年底,北京、天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一类的组织。他们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产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如果半工半读互助团能够成功,逐步推广,那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便会逐渐实现。他们希望把工读互助团推广到全社会,实行“和平的经济革命”。但是,成立不久,就发现离现实生活太远,由于经济困难而难以为继,加上团员观点分歧,人心涣散,很快就宣告解散。新村主义者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和美国的劳动村,试办中国的新村,结果也是昙花一现,无法生存。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们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这促使一大批赞成或同情俄国革命的知识青年转而研究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曾经专门从杭州跑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试验的施存统在试验失败后就指出,“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他还著文表示,“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与此同时,在“工读”、“互助”等思潮影响下赴欧勤工俭学的不少进步青年,到了欧洲之后,一方面通过到工厂做工广泛接触西方社会,亲身体会资本主义社会下层群众的生活,另一方面大量研读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著作。许多人经过反复比较和思索,终于逐步靠拢无产阶级,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 1920 年 8 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所组织的工学世界社就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在爱国斗争中所显示的力量,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获得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伟大作用,表明了自己是中国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和最坚决的救国力量。战斗的工人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也

把改造中国的希望从寄托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转而投向工人阶级及劳动大众。他们从救国方案的选择,进一步发展为历史观、世界观的转变。他们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改变了过去轻视劳动人民的态度,从而推动他们深入工农,关注和研究劳工运动,并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强有力的领导阶级,而知识分子在投身工人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自身的转变。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四,中国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理论体系,是实现救亡,通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在阶级社会中,这一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劳动人民是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的创造者。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抗剥削、压迫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近代中国人曾多次为救亡而左冲右突,却总找不到,或认不清真正的斗争对象,因而屡战屡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不仅使人们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人们认清复杂的社会现象,探索社会革命的途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为革命者投身于革命实践找到了力量源泉。

第五,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为近代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自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等人提出“大同社会”的构想以来,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温饱亲密和谐的社会,就一直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人对这种美好社会的追求,从来没有随时间的变迁而改变过。直到苦难的近代,人们还始终把救亡与建立美好新社会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设计的“人间天国”,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美好未来

的向往,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构想,都带有这种美好追求的浓厚色彩。

当然,科学社会主义与这种“大同”空想有着质的不同,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构想同中国人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描绘的某些相似性,才使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引起了先进分子的关注。这样,他们终于通过十月革命发现了比进化论、民权观更为高级的理论形态。强烈的爱国责任感和不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极限的激进民主观,促使他们迈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关键性一步。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绝不是突发性的选择,而是长期探索中的救亡救世理想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总之,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既是近代救亡主题的现实需要,又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美好社会不懈追求的结果。而十月革命正好是顺时应势,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为中国人民走向未来架起了一座桥梁。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一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然会给中国革命指出正确的方向。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苦难的中国才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2000年第7期)

“五四”批判精神辨析

郭亚全

“五四”前后的文化是以反传统的特点载入史册的。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再造新的文化体系是“五四”时期的核心内容和永恒的主题。而这其中最可称之为精髓的就是“五四”的批判精神。“五四”的批判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甄别和驳难,使传统文化的优劣短长在现代文明显微镜下暴露无遗,它在人们的思想上所引起的震荡和思索,是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基础,功不可没。

一、“五四”批判精神是向西方学习的必然产物

当鸦片战争的炮声把人们从封建社会的梦境中拉回到现实的时候,一些中国人才如梦初醒一般惊奇地发现:中国落后了。西方的军事和经济势力进入中国,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强烈地震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人们在了解和研究西方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由过去的盲从和推崇转向怀疑、批驳甚至否定。“五四”时期批判精神的形成,正是中国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一次总结,是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一次飞跃。

批判传统与学习西方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学习得越多,否定就越彻底,批判和揭露也越深刻。批判精神的影响力投射到文化领域就是人们在努力寻找思想的突破口,竭力引进西方思想。胡适就曾经说过:“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

如此方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①介绍西学最热心、成就颇高的严复更是说得明白:“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亟明矣。”^②中国先进分子提倡引进西方文化,就是因为它给我们送来了一个“评判的态度”。正是这种“评判的态度”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思想僵局,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可见,“五四”批判精神之产生确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陈独秀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这种精神的最简明的解释。凭借这两个武器,“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把矛头直指儒家文化的化身孔子。通过文化的全面反传统,把对旧观念、旧社会和旧制度的厌憎之情注入文字,传入人们的思想,形成对制度的否定。这便是“五四”时期批判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路径。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源于西方文化的输入。

二、对“五四”批判精神的分析

“五四”时期的批判精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酿造的思想与接受了西方文明之后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相激荡的必然结果。无论从中国史的角度,还是从世界史更大的范围来看,“五四”时期批判精神的出现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曾有过的。政治的失败摧毁了人们心中牢不可破的信念,加深了他们与中国传统的距离,积淀下了反抗传统的思想素质,在羞辱和困惑中人们开始寻找救亡图存的希望。西方文化的切入正好弥补了人们思想中废弃传统后留下的大片空白,于是出现了对传统的宣判。

“五四”批判精神的核心是否定自我,这也正是“五四”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主要表现在:

(1)它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对传统文化的精髓哲学提出了批判。胡适认为,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找到那“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我们才能“以最有效的